

Wang Dao Yu Ba Dao

# 王道与霸道

——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

赵金科 林美卿...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Wang Dao Yu Ba Dao

# 王道与霸道

——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

赵金科

林美卿...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道”与“霸道”: 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  
考量 / 赵金科, 林美卿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17-1379-7

I. ①王… II. ①赵…②林… III. ①比较文化—研  
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6348 号

---

## “王道”与“霸道”: 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

---

出 版 人: 和 葵

责任编辑: 王曷灵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6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0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 代序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知识界许多痛感落后挨打的文人学子身怀救世济民之志，以“救亡图存”与“启蒙大众”为根本，以西方文明为进化的参照坐标与社会变革蓝本，试图通过分析中国衰落与西方崛起背后的文化基因，探寻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思想文化路径，并由此开始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漫漫征程。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国学大师。可能没有人会料到，这一进程以及对如何认识和对待中西文化的探究竟是如此的曲折、迂回与复杂。如果说“天朝上国”、“华尊夷卑”是古老中华帝国子民的普遍信条，那么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方式拉开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上的文化比较大幕。如果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等思想虽然已经明显宣告了华夏文明“唯我独尊”神话的破产，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却不应当改变。那么，彻底扭转“贵夏贱夷”意识理路的则是新文化运动。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决绝反思批判的方式，确立了近现代以来膜拜“西学”和全盘抛弃“中学”思想演变的基本框架与范式。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后为转嫁国内危机与尖锐的阶级矛盾所引发的惨烈世界大战，加之巴黎和会所暴露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霸道”本质和强权政治，使得许多原本心仪西方文化的人士，看到了表面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其实还存在着“贪婪、自私、血腥、残酷掠夺”的另一面。而由列宁所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则为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和模板。于是，正如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所言：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

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文化精神动力，其实是奠基基于马克思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深刻揭露与批判而形成的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与追求。其中所蕴涵的消除贫困、阶级剥削压迫，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等价值理念与理想，恰好契合了中国古代儒家孜孜以求的“小康”尤其是“大同”社会的理想目标，因而成为了无数中华志士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精神家园和前行支柱。同时也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取得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案例。“文革”期间对中西文化的全然摒弃体现的是毫无理性思维的极端之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用西方文化“蓝色文明”取代中华“黄色文明”的思维方式则又昭示着文化自卑现象的借尸还魂。而其间“国学热”的澎湃则只不过是对这种西化思维的反叛与抵制而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通过对比“西方模式”危机、尤其是2007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和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模式”的成功效应使得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开始逐渐恢复。当然，究其根本原因，就其文化自觉与精神溯源而言，还是恢复或者重新确立了自汉唐以来那种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之所以然。其实，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文明都各有特长，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认为的，文化的差异不是一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路向。因此无论是中外还是古今，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必然会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只有善于学习、取长补短才是正途。北京奥运会期间，季羡林先生对“人文奥运”的诠释，“一句是宣传中国优秀文化，一句是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应当成为对待中西文化的主流意识。客观地说，许多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认识仍然需要假以时日。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对于擅长整体、综合思维与辩证生存智慧的华夏民族来说，不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据此，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追寻各自文明与文化的价值理性，分析与厘清其对于人类文明生存延续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积极意义和普世伦理，就成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由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金科和林美卿所著的本书，通过

“王道”与“霸道”这一视阈，分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特点以及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希望引起同仁的关注与讨论。

周忠高

2012年1月12日于济南

# 前 言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充满悖论的历史，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荆棘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物质的文明发展、科技进步是以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作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由原始社会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社会转变时所言：“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开始陷入主体意识的萌发和不断膨胀、自我和个体观念唯我独尊、物质主义、感官欲望永无止境的人造泡沫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导致了人类整体精神状态、价值理念的沉沦以及地球世界的失序和浩劫。今天，当人类沉浸在科学主义的巨大胜利和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所谓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所谓“普世伦理”的无限渴望所造就的梦幻语境之中意乱神迷之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人口膨胀、恐怖主义、精神危机、地球爆炸的阴影也随之而来且挥之不去。

而当人性欲望泛滥、思维极端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还处在萌发之际，“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就以敏锐的视界看出了这种消解传统价值观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拯救人类和地球家园的呐喊。中国的东方圣贤儒家孔子、道家老子等学派提出了“仁爱”、“王道”、“博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著名思想；印度的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宣讲了他博爱众生、普度

灵魂的人佛之约；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则以对话体的方式吹奏着他那在有些人看来并不理想的“哲学王的国家”序曲。虽然他们生长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拔除众生之苦，拯救人类迷失的心灵，追寻人类精神皈依的永恒家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孔子喋喋不休、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救世主张时，却被看成了一个迂腐、保守、固执、不合时宜的“丧家之犬”；而当低调、“世故”而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子用他那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构筑他的“小国寡民”简约境地时，又被人们看成了一个抑郁不得志隐者的梦呓之语；擅长思辨主张节制是美德、由哲学王统治的柏拉图式的公有制“理想国”最终也被诠释成了乌托邦式的“失乐园”。

思想家总是孤独的。一种思想的伟大价值只有历经历史长河的反复洗礼，才能充分体现出其真理的光芒。其实，孔子“仁爱”、“德政”、“王道”的主张说穿了只不过是“让世间充满爱”的真知灼见，就如同中国墨家的兼爱、佛教和基督教的博爱一样，只有大爱才能拯救人类灵魂和地球世界，也只有“道法自然”、和谐、节制、“慈、俭、不居先”、“天人合一”、“忠恕之道”才能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人类中心论、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都只会加剧群体与个体、民族与国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尖锐化，成为高悬在人类和地球之上的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于当代全球性面临的难题，葛荣晋先生曾这样概括道：一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由于西方原子结构论和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造成当代科学发展的危机；三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造成人际关系失衡，人格为物欲、金钱所扭曲，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四是由于东方经济的起飞以及它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东方式管理思想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由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葛荣晋：《儒道智慧与现代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正应了中国古代那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何消除这些人类自己制造的危机和灾难？如果我们还不尽快反思与行动起来，那么，人类的终极命运只能是随着地球的不堪负重而陷于灭顶之灾。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

解决这类问题，用近现代西方的“霸道”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过去，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原点时代中，去汲取属于中国“王道”思想文化中所蕴涵的“淑世主义”、“和平主义”、“天下意识”、“天人合一”等原生态精神智慧价值。“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总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向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说得好：“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转引自胡祖尧：《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月17日，第三版）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第一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在21世纪里，人类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光明，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避免这一黑暗，就有必要创立与前不同的思维和制度，尤其是涉及国际间互助交往的思维和制度。对这种思维和制度，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就是儒家文化追求“中和”的宏大理想以及“和而不同”、以“仁”爱之心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转引自骆承烈：《儒家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意义和作用》，张秋升 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51~452页）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贯穿儒家文化中的“王道”思想，的确是蕴藏这种生命智慧的无尽宝藏，等待被不断挖掘。一定意义上，“王道”与“霸道”是表现东西方文化本质差异的内在基因与主要着力点。池田大作援引汤因比的洞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铭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中国文化是德性“王道”文化、和平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

“霸道”文化，战争文化。江建国先生借用《现代性与暴力》的作者特拉维尔索教授的话语指出：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大屠杀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本身，把希特勒“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归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及其开现代管理制度先河的泰勒制流水线的出现。（《人民日报》，2005年04月26日，第十六版）

陈独秀在比较中西思想文化的主要分野时，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黜武穷兵，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而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4号）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把西方文明称之为以武力和利益为基础的“霸道”文明：东方文明则是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王道”文明：“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国父全集》，第2册第8卷，台北：台北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

基于这一思路，笔者试图从“王道”与“霸道”——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的视角，通过中西文化的滥觞、嬗变历程的轨迹思路及其演进历程，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分析。一则解读和诠释中西文化各自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及其精神特质，二则以便从中找到一种能够真正从人类的整体生存、未来和前途命运着想，具有超越时代、种族、地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体制制度等制约因素，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自愿接受的文化形态、价值理念及其思维模式，这是作者的最大心愿。这种做法，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传承、光大和宣扬，抑或是对于加强世界各国、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从而架构一种新型的基于仁爱、和谐、共生共荣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和良性秩序，都应当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异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反观自身，从而总结出自己的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普遍

采用的方法。特别是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从中国的近代就已经开始。有的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比较，有的从哲学角度比较，有的从总体上进行比较，有的还从某一个具体的侧面进行比较。……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不仅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中西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渠道，有利于中西文化之间相互吸收、优势互补，进而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的全球文化建设贡献各自的力量。”（姜林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儒学》，张秋升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67~468页）

诚然，尽管这种努力，有时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理论与现实之间有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以力服人”的实力强权政治及其“霸道”主义思维其实一直是现实世界之铁律，即使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改变现实世界的残酷和非道德性，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种“世界文化”。但正如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所揭示的：现实存在的东西，如果没有合理性，终归是会灭亡的；而那些合理的符合规律、具备亲和力和普遍性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所以，即使“王道”文化及其政治理想的理论语境与文化诉求从来就没有、甚至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也无损于它的思想价值和真理性光芒。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大同世界”、“理想国”、“自由人联合体”及其所描绘的桃花源式的和合境地，那么人类还能够保持对未来勇往直前的理想、信念、美好愿望与不竭动力吗？此时此刻，或许只有借助司马迁对孔子人品与学识之景仰所发之感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这或许最能表达笔者此刻复杂的心情了。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代序言 .....                           | 1     |
| 前 言 .....                           | 1     |
| 第一篇 中国“王道”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       | 1     |
| 第一章 儒家“王道”文化之内在情感与外在规范 .....        | / 4   |
| 第一节 孔子“王道”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精神维度 .....       | / 6   |
| 第二节 孟子“王道”思想文化的价值意蕴 .....           | / 36  |
| 第三节 荀子“王道”思想的文化基质 .....             | / 60  |
| 第二章 儒家“王道”文化之思维方法与终极归宿 .....        | / 76  |
| 第三章 道家、墨家、佛教、兵家、中华武术等“王道”文化视阈 ..... | / 105 |
| 第二篇 西方“霸道”文化的思想特征与现实考量 .....        | 137   |
| 第一章 西方“霸道”文化之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 .....        | / 141 |
| 第二章 西方“霸道”文化之思维方法与现实归宿 .....        | / 164 |

第三篇 以“王道”之理想培育“霸道”之精神,构建和谐中国与  
和谐世界 ..... 179

第一章 以“王道”之理想培育“霸道”之精神 / 183

第二章 以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指导 / 227

后 记 ..... 247

主要参考文献 ..... 248

## 第一篇

# 中国“王道”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共同体。由于绝大多数时间总是地少人多，没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而土地又是当时最主要的稀缺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的主要来源，这就造成了对土地的直接依赖和无限崇拜的当下意识。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型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底蕴。财富的稀缺性决定了中国人的勤劳、俭朴、乐天知足，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强烈的纵欲主义色彩。勇敢、智慧、自强不息，为生存权利而斗争，不管这种生存障碍是来自自然或是社会，从而型塑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如果说大禹治水、都江堰工程所展现的是中国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人类奇迹；那么，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则是在与社会抗争的过程中，凸显出中国底层民众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奋勇之举。

生存竞争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生存智慧的灵光。中国古人在如此贫瘠的土地和严酷的环境中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科技、最壮观的水利工程等农业文明，不能不说是中国智慧和中华文明的灿烂篇章。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所保持的世界领先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形态所展现的悠久辉煌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化和文明史上最光辉夺目的一页，这是世界古代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尽管近代以降，中国文明黯然失色，经历了百年以来的衰落和耻辱。但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毕竟只是沧海一粟。同样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产生的文明”的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而其他的三大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早已灰飞烟灭。“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华文化的“王道”和平主义精神所致。中国文化是德性伦理文化，中华民族强烈的天下、国家、家庭、个人一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仁爱、宽容、厚德载物、礼义当头、以人为本、文化崇尚、“替天行道”精神以及“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和谐”的思维模式等等，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王道”思想文化及其当代语境的溯性与展望，无论是对于积淀和彰显中华民族文明礼仪之邦，促进华夏民族的融合、团结和统一，还是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特质，以及加强中国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沟通，维护世界和平，仍然具有

极其重大的历史、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3 年 12 月 10 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其现代启示做了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 2000 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著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提出广泛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人民日报》，2003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2011 年 9 月 6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开宗明义的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

## 第一章 儒家“王道”文化之内在 情感与外在规范

——“仁爱”、“性善论”与“德治”、“仁政”、“王霸共举”

“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篇：“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时的王道之涵义，主要是指周先王等治理天下的先王之道，一种治国之政治思想、信仰、历史经验。孔子心目中的“王道”就是夏商周三代先王之道，具体说来就是“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之治世之道，尤其是周公主持制定的西周的礼乐制度。“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王道政治就是指依王者之道所从事的政治，故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2页）

孟子则把“王道”视为与霸道截然对立的道义原则、仁政治国理念、模式与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手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与孔孟先王之道的内涵略同，但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的基本路径却与孔孟产生了歧路。荀子主张隆礼贵义、礼法并用、“王霸共举”，“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而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认为道义原则（天理）应当先验、超越于先王之道之上。“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1）朱熹对“王道”的理解与先秦思想家